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13位ISBN编号：9787108041852

10位ISBN编号：7108041855

出版时间：2013-3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张光直

页数：44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内容概要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是作者考古学论文的精选结集，收录有19篇论文。包括考古学学科意义及其与历史学的关系、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古代巫觋文化的特点及其在王权形成中的作用、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原始社会考古、殷墟考古等。作者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在文明的交互作用、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的关系、古代王权兴起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

## 作者简介

张光直，著名美籍华人学者、考古与人类学家。196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后历任耶鲁大学人类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教授兼系主任，之后转赴哈佛大学继续担任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于1974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0年获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研究专长为考古人类学，在美国任教三十多年间，一直致力于考古学理论和  
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张院士以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数据，对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和文化有极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专书十余本，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古代中国的考古》(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和《商文明》(Shang Civilization)已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上古时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著作。

## 书籍目录

前言

考古学与“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

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

对中国先秦史新结构的一个建议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断代

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料

仰韶文化的巫觋资料

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

中国东南海岸的“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

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起源问题

台湾省原始社会考古概述

新石器时代的台湾海峡

“浊大计划”与1972年至1974年浊大流域考古调查

浊水溪大肚河流域考古——“浊大计划”第一期考古工作总结

圆山出土的一颗人齿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

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

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

殷墟5号墓与殷墟考古上的盘庚、小辛、小乙时代问题

《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

##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放射出来的文化扩展是合理的解释。作这种解释的基础是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在中原有一串完整的系列，而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当时没有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系列，因此在东部和东南海岸地区的与中原类似的文化想必是自中原较早的文化传布而来的。可是到今天这个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在好几个区域中今天也已经有了完整的或近乎完整的发展系列了。因此，“龙山形成期的大扩张”不能再来作为解释龙山形成期的理论基础。但如西谚所云，我们却不可把婴儿与洗婴儿的水一起倒掉，因为婴儿——龙山形成期——是真有的。沿着史前时代交互往来的路线在几个区域文化之间移动，我们不妨自大汶口开始。沿着海岸平原我们可以走入马家浜文化的领域。从这里我们有两条路线可走：向南穿过杭州湾到河姆渡的领域及其更南到东南海岸，在这里稍后我们可以接触福建的昙石山与溪头文化和台湾的凤鼻头文化。另一条路是自马家浜转向西而沿长江向上游走。在这条路上我们先碰到安徽的薛家岗文化，然后在江西又碰到跑马岭文化（或称为山背文化）。从这里我们可以再向上游走到湖北的大溪和屈家岭文化，或沿赣江转向南方走入粤北和石峡文化。在这些区域的已知的文化和遗址不都是完全同时的，但它们的文化传统都是彼此平行的，只是多半都还没有为考古学所揭露。一般而言，在年代学上看北方稍早（公元前第四千纪）而南方稍晚（公元前第三千纪早期），但这可能只是由于资料不全所产生的幻象，而且至少所有的区域之间都有重叠现象。沿着东海岸和长江流域做这个贯穿各个考古文化区的假想中的旅行，我们会看到我们所遇的史前居民在物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之点。

#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

## 编辑推荐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作者立足于实践调查和中国考古学实际材料、吸收区域文化多元说等新理论，在文明的交互作用、东南沿海与南岛语族的关系、古代王权兴起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严谨精当的见解。

## 精彩短评

- 1、读这本书，最让我感动的是李济在1954年写给张光直的一封信：...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做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人生如遇良师，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 2、精装硬壳本，装帧有诚意。纸张白皙。一套九本，目前未出版一本：古代中国考古，期待这本
- 3、该著作涵盖张先生的十九篇文章，都是经过本人慎重择选出的，价值之重无需细谈，读来感受最为贴切。
- 4、这是我高二时买的第一本人类学书。
- 5、这本书给我最大的启发，一是对台湾考古的新认识，二是“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则是对商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 6、尽管本书收集的文章偏旧，内容也不多，但行文和引用风格都反映出作者所受到的合格的学术训练
- 7、张光直先生的书读来非常舒服，现在还差两本没读过，如有时间，需要静下心来体会。
- 8、讀多了覺得張氏的文章內容重複的不少

1、巨人之躯2013年时，三联书店再版了张光直先生系列作品（全九册），是迄今国内出版先生作品最全面的一版。作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界最富国际声誉的学者（曾任哈佛大学人类学主任，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光直先生这些作品大多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在八十年代以来便陆续译成中文。时值先生去世十二年之际，重读作品，历久弥新。这些作品既有用考古学材料建构史前中国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也有总结、阐释商代考古成就的经典之作《商文明》《中国青铜时代》，更有收集了先生大量随笔、序文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以及回忆早年生活的《番薯人的故事》。得益于这些丰富的素材，我们可以一窥先生一生的考古心路。作为台湾第一位白话诗人张我军的次子，光直先生是位台省籍人士，可因为青少年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他在抗战胜利后随全家返回故乡，心中始终怀着对古老中国的美好感情。既没有1949年左右仓促赴台者的失落，也不似后来海峡阻断之后出生一代台湾学者，虽也研究古史，心里却失落了对古代中国的眷恋。比如，研究西周制度的杜正胜，实际忝列“绿营”，以“羌史”成名的王明珂，在颜色上也颇为暧昧。而这一切在张光直先生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先生身为台籍，对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正是这种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使其几乎以一己之力，将上世纪中后期，中国史前考古的脉络维系一身，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古代中国考古学》的译者在2002年版的“译后记”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张光直先生一直在同病魔作斗争。...1994-1997年他又数度坐轮椅来到北京，并曾奔赴他念念不忘的商丘考古工地。.....先生的身躯虽小，然骨头是最硬的。在他的身上，我真正体会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伟大。”2001年初一代考古学巨擘张光直先生在美国麻省因帕金森症去世。先生去世时，刚过古稀，在普遍高寿的考古学家中算是“英年早逝”。在有限的生命中，先生写下诸多著名考古学作品，芳泽后世。其中尤以对“商文明”、“中国史前时代”两方面的成就为最，至今未被超越。“先生的身躯虽小”，却无愧考古学领域“最后的巨人”。巨人之迹先生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主要有两项，第一项是众所周知的对“商文明”的综合阐述。上世纪中国考古学从无到有，在很大程度上与“商代”的发现有重要关联。1920年代末，在傅斯年主持下，李济、董作宾等考古学家发掘了大量包括殷墟在内的史前遗迹，但苦于抗战动荡，无法安心整理、研究，内战后期这批材料中除部分留在大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被携往台湾。加上此后1950年代的两次重大发现，基本奠定了已知商代文明的认识格局。其一是五十年代初“郑州商城”（早商遗址）的发现，其二是五十年代末“二里头文化”（夏、商之际）的发掘。但是，两个原因阻止了当时对“商文明”进一步的整体阐述。一方面，中国考古学基于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传统方法，天然缺乏对包括生产、分配、祭祀、权力在内的文化全貌进行系统分析的能力，也更无法从“文化互动”的角度探索文化遗址之间“时空连续性”的可能。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恰好在这些遗址发现后，便进入了一系列运动浪潮当中，使得对“商文化”的跟进研究经历了五十年代的短暂成绩后，就在很长时间里步入低谷。当时及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商代文明最出色的成果，莫过于陈梦家先生在五十年代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只可惜，陈先生在留下这部巨著后，也不幸早逝。张光直先生虽在海外，却一直关注中国大陆地区的考古成果。同时也接受了当时考古界最先进的“聚落形态研究方法”上的训练，使他事实上成为将“商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阐述的第一人。结合考古材料，他从“安阳所见的商代社会”和“安阳之外的商文明”两个部分进行讨论，系统地阐述了商代中后期和早期两个阶段的社会形貌。从“族群”、“都邑”、“军事”、“祭祀”、“王权”和“方国关系”等多个方面，基本奠定了后来研究者讨论“商文明”的主要议题。（还富有远见地将商代文化与周边大致同时的其他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齐家文化和清江几何印纹陶文化〕并置研究。见图一）翻开今天任何一本介绍商代文化的著作，基本上是不会跃出张先生给出的这几个讨论范围的，可见其影响之深。张先生的另一项成就意义更大，但知名度反而没有那么高。即提出了“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理论。这个理论的简单阐述就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出现了包括仰韶（甘、陕、晋、豫西）、大溪（汉水流域）、山背（鄱阳湖平原）、马家浜（长江下游三角洲）、大汶口（山东半岛）、土珠（辽东半岛）和红山（辽西、内蒙东部）在内多个文化区域，“所有的区域文化在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都更广泛地分布，而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趋于深化，终于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见图二）。这一理论是张先生十分看重的成果，最早刊于耶鲁大学1968年版《古代中国考古学》，后亲自翻译刊登于《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中，在其《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中也多次出现。虽然没有像“商文明”研究那么令人瞩目



，毕竟马家浜、大汶口等史前文化对于考古专业以外的人士，多嫌陌生，但这一理论其实是对苏秉琦提出中国史前文化“满天星斗”论的积极回应。如图所示，张先生并不认为具体的文化区域是孤立独行的，在更大的范围内，相邻文化区域存在直接影响，通过文化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联，甚至能构成一个闭合的“循环圈”。只是这个循环圈未给出方向。这两项成果可以说是张先生一生探索中国史前史最重要的贡献，“商文明”研究是对已知商代遗存最全面的总结，“中国（文化）相互作用圈”则是对商代之前古代中国的更深入探索，至今未被超越。当然，由于时代局限，这两项贡献也留下了许多值得探索的空间，如果今人稍加注意，或许就能从中发现更多。巨人之踵光直先生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拥有超乎常人的敏锐视觉，这两项成果之间也是相通的。研究新石器时代互动文化圈，就是为了打通商文明与早期文化之间的壁垒。他给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绘制了富有启发的“相互作用圈”，但没有判定这些文化相互影响的趋势，参图二。同时在“商文明”研究的领域，阐述了商代中国从二里头到郑州商城，一直到安阳殷墟的阶段特征，以及周边的其他文化，参图一。同样没给出商文化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他始终未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那个缺失的环节。或许是两个原因造成了这种遗憾，首先，他直至去世之前，都执著相信，商文化的源头可能是在殷墟东部的河南商丘——这里是商纣王同宗微子启在周代延续商嗣的封国——只是这里至今都未能发掘出任何早于西周初期的遗迹。然而，他在《中国古代考古学》中已经非常肯定断言“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而不是商代早期文化”，这种执念源自对“商人东方（海岱文化）起源”的坚信，以至于他在研究中几乎没有提到八十年代发现的“偃师商城”，更不用说，在他去世前不久（1998年）开始发掘（2014年获批准再次发掘）的焦作“府城商城”遗址——因为这些早商时期遗址都在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的西部。其次，受同时代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炊格尔、英国人类学家杰克·古迪对早期文明及简单社会“王权”与“神圣祭祀”关系假设的影响，他也对“王权”以外基于物质交换导致的文化流动持保守态度。在“古代贸易研究是经济学还是生态学”（《中国青铜时代》）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我不相信在考古学研究上贸易应当当作与文化系统的其他亚系统，如生业、技术、社会与象征等亚系统平行的另一个亚系统来处理。”实际上，强调生产-再分配方式的“物质文化”研究在最近二十年已经成为考古学中非常主流的研究范式了，相反关于纯粹的“王权”研究，则因其假设体系的失之证明，而日薄西山。或许正是这两点因素，成为这位考古学界“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修正了张先生判断上的两个问题（一、比殷墟（商代晚期）更早的商代早、中期遗址都在其西部，而非其东；二、物质交换其实是文化系统中最关键的要素之一，且存在流动趋势。）之后，重新来看待张先生奠基的史前中国成果，我们或许就能窥到前辈之所未见。如图二所示，张先生证明了商代之前的东亚存在一个“（文化）相互作用圈”，包括夏人在内的华夏先民，都是这个体系中的部分。而商人的“来龙去脉”，也当受此趋势影响。周人灭商后，后裔王子禄父曾经向东北方逃遁，而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在黄河下游的商丘。如果这算作商人迁移的“去脉”，那么当我们把商文化从“二里头”开始（包括偃师商城、焦作府城商城），一直延伸到商亡后的归宿用曲线连接，就几乎获得了一条自西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曲线（见图三）。那么当我们将图一和图二通过对比、叠加、重合，并对照图三之后，就会发现，图二中“文化”与“文化”之间互动作用的箭头不应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且将各组箭头连接起来后，就能形成一个“逆时针”循环圈。当这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形成的“逆时针”循环圈与“商文化”的迁移方向结合起来时，甚至就可以判断出商文化的“来龙”。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个“逆时针”循环的存在，那么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文化发端的过程，就可以形象地描述为一条古人在数千年里沿着逆时针方向在东亚大陆迁移的螺旋曲线。通过这条曲线的反向延伸，我们就能追溯“先商”，乃至“夏代”的脚步。这是张先生为当代研究者留下的遗宝。这样的趋势为何没能从张先生的研究中直接反映出来，既有传统因素，也有时代原因。一方面是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始终将渤海湾以南滨海视作商人起源之地（其实燕山以北的渤海湾以北也能符合“商人东方起源”的传说）。另一方面，某些对当代考古学发展趋势的认识误差，阻碍了他对中国史前文化变迁趋势的准确判断。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他在当时以及今天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对中国史前文明的执著信念和超凡的专业认识，使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力推动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达到了至今无法超越的高度。这是同时代“海峡两岸”大多考古学者无法企及的，这从张先生独立完成的作品至今全数集结再版，而某些举众力而为的“断代工程”除了薄薄一册“阶段成果报告”，之后再无音信可得互见。光直先生以“瘦弱”之躯肩扛中国考古学的过去，在考古史中投射高大身影。斯人已逝，智慧永驻，再次翻看先生作品，既是对前辈求真精神的缅怀，也是对今人的一种鞭策和勉励。<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5/2/15/1238958.shtml>原网址有图。



## 章节试读

### 1、《中国考古学论文集》的笔记-第106页

饶宗颐应为饶宗颐

##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http://www.tushu000.com)